



攝影：Russel Wong 黃國基

貓魚

陳
沖
著



「貓魚」是當年的上海話，
菜場出售一種實該漏網的小魚，
用以餵貓，滬語發音「毛魚」。
隨着以後貓糧的出現，
它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

那些不記得的，蜂擁而來

金宇澄

「我陳沖，這次是帶媒體來拍上海，也可能會來拍作協……嗯，拍梧桐樹當然也可以的，5:45 到 6:15 是黃金時段……大清早的上海，現在難得看到了，這半個小時是最好的……我準備化妝了，因為拍戲，最近腦子裏全部是戲，不曉得上海情況了，真的不記得了，儂（你）幫我答幾句好吧。」我提到梧桐樹飛絮擾民的新聞。她答：「為啥不擾啊，漂亮的東西都要作的。」

這是她自編自導某部電影期間，從新疆飛北京見了剪輯師，然後趕來拍上海的短片，那天的梅雨無休無止，和平飯店窗外緩慢移動的海輪、作協的鳥鳴，都伴有淅瀝雨聲。等她開始每月在《上海文學》連載這部長篇，寫到編導這部電影的一稿就想到她曾經的語錄——你說你「腦子裏全是戲」，這戲究竟是甚麼？你得仔細寫寫，片子至今沒有放映，紙上就可以還原，可以詳盡一寫等等。但她給我的印象是退回當年的梅雨中，「不記得我當時想啥了，真的不記得了，不記得了」。

感覺她的寫作，是徘徊在「腦子裏全部是戲 / 完全不記得了」之間的狀態，沉浸於只屬於她的內心景象裏；比如一度我們都關注已故導演彭

小蓮的生動回憶（也曾刊載於《上海文學》），對電影製作過程的細微描述，尤其表現 80 年代閘北上海電影技術廠洗膠片現場的筆力，都給她極深的印象，但在以後的寫作中，絲毫不受任何影響，她的文字和文學觀，對於物、對於專業技術參數的描述興趣有限，只落在情感、思緒、聯想的畫面中，面對編輯建議，她慣常回應就是已經不記得了，完全不記得了。

多年前她約我見面，是想做一種「歌舞片」，借用《繁花》一章的某幾頁，再現一群年輕人的面貌和音樂感，那年頭的男女，差不多的單調服飾，只有兩個「不良少女」像斑斕的花蝴蝶一樣飛來飛去。她說要把三層樓的房子一面牆拆掉，讓演員從下唱到上，從上跳到下，最後演變為載歌載舞的一種視覺狂歡。我說，如果是這種狀態，根本就不會好看。她則用完全信任的直感說，她要的就是這感受，這是一種特殊意義的審美，肯定會很好看，你是根本不會懂的。為了這事，她專程去了香港，王導也答應了說，是可以試試看的；然後，她可能是忽然有了編導上述電影的強烈感受，因此作罷。

編輯注意每一篇連載的走向，作者則活在自有的延伸裏，看定自有的遠方，依靠自有感知，延展自有的緊密回憶鏈。光陰荏苒，編輯因此轉為注重稿件的某些關鍵詞，比如多次提到了哥哥陳川，卻並不展開——你當時出國，陳川為甚麼要送「西伯利亞」貂皮大衣？有點簡單了，完全可以展開；為甚麼陳川那麼想出去？原因是甚麼，是怎麼就走的，一個人能帶那麼多畫嗎，等等等等——現想想這麼設問，也可能是整個青年時代，我沒遇見過一個美術青年。

她說，不敢寫陳川，怕寫不準確他看了不開心。

那段時間，陳川只要回滬，照例去 M50 同夏葆元、王申生他們畫人像素描，一個素描的麒麟會。有次她興沖沖陪着陳川來編輯部，說要替我畫像，記得那天陳川說，他很多年裏不知畫了多少人像，都是當場就送人的。我說，自己畫的為甚麼要送人？今天這幅你一定要留着。我注意到在陳川面前，她不那麼自我了，只注重陳川的狀態，多次提醒周圍人閉嘴，保持安靜。所以說，你看——我在微信裏告訴她，陳川那麼和藹，仔細寫寫他是沒任何關係的，我可以保證陳川根本不會生氣，快寫吧，仔細寫一寫，完全沒問題，寫吧。

這可能是最有舒適感的編輯記憶了，一個月後，收到詳細描述陳川的大段文字，其中還包含了陳川的原文，實在是一種解惑和創建；在那段時光間隙裏，兄妹倆竟然呈現了濃郁的上海文藝氛圍，幾乎是一部關於上海的文藝電影，或陳氏的歌舞片，美術、文學、詩歌和琴聲，壁爐跳躍火光，喃喃的深夜私語，都有別於我看稿經驗裏的上海文學質感，我會聯想到那或許就是有別於北京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虛構小說缺失的現場，被非虛構文字完成了。同樣難忘還有「貓魚」的驀然回首，它就此一路緊緊相隨，一直對接到了去歲，待她詢問這部新書的書名時，這兩字脫口而出，它仍然、當然還活着，頑強生命的本身，始終那麼弱小和無助，自帶顯而易見的尾聲，卻仍舊是在堅守之中，苦苦期待。

以後，就是本次連載即將結束的階段，作者 / 編輯都關注了一部剛面世的非虛構，如能藉此假設一種文本意義的電影，一個連載紙上的編導演繹版，你就可以從青年一直演到老年，我建議說，你肯定沒體驗過，紙上王國，向來是個人的獨自完成，這有多自由，何必拖着一堆劇組和燈光呢，不用化妝，始終就做女主，異於電影人準則，你說演，就可一直演下

去，試試看，很可能就是壓卷之作了……這些來來回回的絮叨，餘音在耳，最後，緣自複雜的變故，此事終於作罷。

記得她問過，人為甚麼要回憶？或者說，你為甚麼要回憶？

留住它們，告訴更多的人。

那為甚麼要留住？

記憶是個人的，特別的。

不特別的記憶，就沒意義嗎，我更想知道回憶對於你自己意義何在？

是紀念。我勉強地說。

回憶、回味一種滋味，是普魯斯特的一陣風，分明聽到身後有低語，回首卻空無一人……也等於你終於寫完了這本厚重的書，那些你不記得、拋卻腦後的內容，那些毫無印象、感覺的時光、完全付與塵土的表情，仍然在字裏行間裏蜂擁而來，那麼耀眼，那麼栩栩如生，或許，今夜你因此失眠。

我記得你說過，寫《洛麗塔》的納博科夫，形容懸崖上的搖籃——我們應該本能地知道，生命，就是黑暗裏劃過一道亮光。

二〇二四年五月七日

是笑容，不是笑聲

姜文

陳沖的文字比她的電影更早地被我看到。

八十年代初上大學時我就讀過她的文章，
那會兒我還沒看過她的電影。

她的文字，自有特點。

不是練出來的，

不是苦出來的，

不是裝出來的，

也不是天生麗質那種。

甚至跟她說話都不是一股勁兒。

她的文字源自她的感受力和審美。

那股勁兒更像她的眼神兒和笑容。

是笑容，不是笑聲，

尤其是她肉笑皮不笑的時候。

她，像是有好幾個不同的人長在了一起。

她的文字，倒像個豐富而果敢的人在講着誠實的故事。

《貓魚》是陳沖珍貴的個人記憶，寫得鮮活、深邃。

她毫不畏懼地邀請你踏入其中，經歷她的人生，

結識她的朋友與家人……

這種勇氣，不是誰都有。

二〇二四年六月七日

前記

記憶，好像早晨愛人離別後枕頭上柔軟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裏存在過的證據。你似乎能感到那裏的溫度，忍不住伸手去撫摸它，把臉貼住它。等你再抬起身，卻發現那凹印已經走樣，失去了他的痕跡。記憶也好像一個犯罪現場，你一次又一次地去那裏查看，反而踐踏了那些手印足跡，丟失了真相。我們的頭腦總是不停地把記憶裏的碎片邏輯化、合理化、美化或醜化，而且每一次造訪，都似乎令它離原始印象更遠一些。我從很年輕時開始被各路記者採訪，不少過去的事，已經被反覆敘述，變成了翻版的翻版，連我自己也很難看清它們的原貌。也許，要保持原始的記憶，唯有不去觸動它。

有一日，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形下，我突然回到了一片未曾被自己過多調用過的記憶，有些只是模糊的印象，也有些清晰猶如昨天。我企圖把它們寫下來，或許人們能看到我在枕頭上留下來的某個凹印。

目錄

那些不記得的，蜂擁而來 / 金字澄 …… 9

是笑容，不是笑聲 / 姜文 …… 13

前 記 …… 15

平江路的老房子 …… 001

你看過《金瓶梅》嗎？ …… 015

「一號人物」 …… 032

快樂的大篷車 …… 056

從前的人 …… 072

沒有女人會因此喪命 …… 108

我怎樣才能理解他 …… 132

消失在童年叢林中的皮球 …… 154

悲傷是黑鏡中的美 …… 174

無法實現的夢想 ……	206
被遺忘的愛之夜 ……	242
一點心 ……	264
靠月光尋路 ……	283
就像雨中的眼淚 ……	308
回不了家的人 ……	330
唯一不朽的只有此刻 ……	355
幻想博物館 ……	376
海市蜃樓般的歸屬之地 ……	402
停留在荒蕪和黑暗的地方 ……	431
將美麗帶回人間 ……	464
幾粒金色的麥穗 ……	492
我們將死於夢醒 ……	524
貓魚 ……	546
孤獨和慾望的顏色 ……	572
大氣層河流 ……	596

平江路的老房子

朋友發來三張照片，不知是誰的公寓，我一下沒懂他的意思。緊接着他發信問，據說這是你以前的家，是嗎？我放大了照片仔細看，甚麼也認不出來。正要給他回信說不是，突然注意到照片後景的鋼窗框，眼前浮現出一個大家都叫「妹妹」的女孩，趴在那扇窗口發呆。春夏秋冬，沒人知道她在等待甚麼，胡思亂想甚麼——那一個個漫長的午後……

天色漸漸暗下來，妹妹的視線穿過一片草坪，父親的腳踏車出現在弄堂口，他沿着草坪邊上的水泥路踏過來。妹妹能看到他車把手上掛着的網兜裏，有個牛皮紙包。一會兒，她聽到上樓的腳步聲，然後，父親就頭頂着那個牛皮紙包走進門來。父親是華山醫院放射科的醫生，有些病人康復後會送禮物給他，有時候是一塊鹹肉或火腿，有時候是一塊布料或一團毛線，這些日常食品、用品在那個年代是非常稀缺的，每次他都會把它們頂在頭上亮相。妹妹喜歡看到他這樣喜悅和自豪的樣子。

父親似乎不怎麼管她，也很少跟她說話。有點像《動物世界》裏那樣，幼崽的爸爸把食物叼回窩裏，再教會牠一些必要的生存技能。父親帶她游泳。上海醫學院的游泳池五分錢一個人，每場一小時。那時候的游泳

衣好像只有大紅和海軍藍兩種顏色，是用一種毫無彈性的布料做的，內面有橫豎一排排很細的鬆緊帶，把布料抽起來，變成一小團。穿到身上鬆緊帶繃開後，泳衣看上去很像泡泡紗。妹妹跟兩個小朋友一起更衣，互相繫緊背後的帶子。她穿着嶄新的大紅色泳衣從更衣室出來，父親在不遠處等着。妹妹抬頭望見他，陽光晃到她的眼睛裏。父親抱起她，把她放進深水，由她掙扎。妹妹用手划、用腿蹬，拚命伸長了脖子咳水，她模糊看到其他孩子在淺水嬉耍，然後就沉了下去。不知過去多久，她好像失去了知覺，一隻大手突然一把抓住她游泳衣肩頸的帶子，像老虎叼虎崽那樣把她拎出水面。妹妹清醒過來，她知道，在緊要關頭父親會保護她的。一小時後，游泳池的鈴聲響起，她已經學會了踩水，以後不會淹死了。

偶爾父親也會帶她玩耍，他們到華山醫院周家花園的小湖裏划船、拍照。荷葉、荷花漂浮在湖面上，小木船繫在一棵柳樹幹上，柳枝垂落到水裏，跟倒影連成一片。這種時候，妹妹總是換上乾淨的衣服，在頭頂右面紮一個翹辮子。她沒有母親那種天然的優雅，有點駝背縮脖子，還結實得像個男孩。記得一位裁縫為她做褲子的時候說，你的肉老硬的。儘管如此，父親還是願意在她身上花膠片錢的。他會跟她說，站站直，或者坐挺一點。拍完後，父親就帶她到放射科去沖洗底片，影像在顯影劑中慢慢浮現出來，神奇而美妙。一個不可重複的下午，一片已經逝去的雲彩，在那一刻定格，成為永遠，就像琥珀裏的昆蟲。

有時候，父親會莫名其妙地發脾氣，或者把她狠揍一頓。當然也不都是莫名其妙的，比方那次她偷走抽屜裏的糧票和油票，然後又全部弄丟了。那個月家裏幾乎揭不開鍋，那頓打是活該的。事後她就病倒了，幾天後的一個清晨，她被一種尖銳的疼痛感刺醒，母親俯身望着她，右手拿着

我的第一個秋天。也許因為光照的關係，家中有不少這個角度的相片。左邊的畫外是我們 10 號的花園；身後左面是 11 號的房子，跟 10 號同樣；右面籬笆後是我和哥哥的幼兒園——民國時期的市政府樓。



廊亭——這也是家裏幾代人喜歡留影的地方。我面對着花園，背後是通往客廳的法式門窗，地上鋪的是上海三四十年代時興的細小白瓷磚。我一直以為自己能記得，這是大姥姥從廣州來探望我們時拍的……後來我看見一張我和她在同角度的合影，才想到一定是因為見過那張合影我才錯覺有這個「記憶」——那是照片為已丟失的記憶接的假肢。





今年的夏

在北海公園

公園的滑梯

上。開始了！

打完的玻璃針筒，左手撫摸她發燙的前額。妹妹發現自己的手心裏，放着一塊黏糊糊的醬芒果，那是她最喜歡吃的零嘴，一小塊可以嘬上大半天。她一陣委屈，知道自己被原諒了，她生病的時候是母親最溫柔的時候……

我踏進如煙的往事，隔着浮動的塵粒，看到那棟童年的房子。它像時間的廢墟中一個完美的蜘蛛網，絲絲縷縷在一束陽光下閃亮。房子門前是一個花園，上三步樓梯後有一塊鋪了細小瓷磚的廊庭。那裏有兩扇鋼框玻璃門和兩扇窗戶，邊門裏是一間臥室，正門通往客廳。經過壁爐再往深處走就到了飯廳，飯廳和廚房之間有一個儲藏室，再下三步樓梯是廚房。廚房後門外有一條通道，似乎總是有人在那裏擇菜、洗菜、洗衣、聊天。我們平常進出用側門，進門有一個暗廳，聽母親說她小的時候警報一響，全家都躲在這裏，因為這是房子裏唯一沒有窗戶的地方。從廳往上走半層樓梯是亭子間和一個小陽台，拐彎再上半層有兩間臥室和書房，還有兩個盥洗室和一個陽台。再上一層是閣樓，閣樓的對面有一個曬台。

啊曬台，那也許是房子裏最快樂的地方吧。我現在的電腦旁放着幾張父親大學期間在曬台上為母親拍的照片。也許是那時膠片感光度的原因，相片似乎都是在大太陽下拍的，還都帶着一點仰角。我曾經以為，仰拍是那個時代的審美，也特別喜歡那些帶着天空和樹頂的通透構圖。直到最近跟哥哥聊天的時候，他才提醒我，當時仰拍是因為照相機的取景框在相機的頂部。攝影師總是把相機掛在胸腰間，瞄準拍攝的對象。原來一個時代的美感，經常是產生於某一種限制。在父親為母親拍的許多照片裏，我最喜歡那張穿翻領連衣裙的。她臉上的笑容是那麼光彩照人，那是在我和哥哥出生之前。在我的記憶裏，幾乎從未見到過母親這樣一覽無餘的笑容。

從曬台往下看是弄堂的後牆，牆外有一片密密麻麻的樹林，再往遠處就是肇嘉浜路的街心花園。路燈照不進樹林，它便成了無處可躲的戀人們親熱的地方。夜晚我們有時會看到工宣隊員打着手電筒，在林子裏和肇嘉浜路的防空洞裏抓「搞腐化」的人。被電筒照到的男女會逃，會哭，會求饒。記得有一天下午，一對男女慌張地鑽進樹林，貼着後牆激動地扭抱在一起，我們看到了就用鉛桶裝了一桶水澆下去，看到他們尖叫着逃跑，我們快樂得不得了。

在我們和鄰居的曬台之間，有一堵一尺厚的高牆，每年國慶節的夜晚，我們就踩上閣樓用的木梯，爬到牆上看煙花。

天氣好的時候，我常在曬台上吹肥皂泡。那年代肥皂是奢侈品，不管我怎麼抗議，母親總是把我的頭髮剪到齊耳根，她說長頭髮洗起來太費肥皂，但是用肥皂來吹泡泡在她的眼裏卻是無可非議的。陽光裏，透明的泡泡，映照着彩虹的顏色，悠悠飄蕩。它們轉瞬即逝，讓我的快樂裏總是帶着一絲感傷。

最刻骨銘心的記憶是那些夏天的夜晚——有時候明月高掛，有時候伸手不見五指。母親把水龍頭接上橡皮管子，再把它掛在晾衣服的繩子上，一邊淋浴，一邊哼歌。她的聲音是那麼的溫柔真誠，她的身體是那麼的光潔圓潤。為甚麼有些不經意的時刻會讓你日後魂牽夢繞？這些夏夜再普通不過，甚麼大事都沒有發生。然而，多年後在大都會博物館看到古希臘人體石雕像時，我會突然聽到流水和歌聲，聞到硼酸香皂的味道。

回想起來，在曬台上洗澡的時候，母親比其他任何時候都要快樂，她似乎在享受一份那個年代所不可思議的自由。我也是快樂的，蒼穹下我

我背後是 10 號和 11 號曬台的隔牆，小時候每年國慶節，我們都騎在上面看煙花。



母親在曬台上。



隱約感到這是一種特權，母親的肢體、歌聲，還有她看不到的微笑，都在向我透露人生的秘密……

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又跟母親一起洗澡。每次回上海我都會陪父母去游泳池。母親佝僂着腰，鬆懈的肌膚好像被雨淋濕的舊衣服，她看着更衣室裏自己的衣服，認真考慮穿每一件的先後次序，然後慢慢地穿上。我望着母親，心情猶如一首輓歌。

我把朋友發來的照片給她看，問她認不認識。她說，這是甚麼地方？我說，平江路老房子啊。她又看了一眼說，不是的。我說，人家裝修成這樣了，光二樓租金就兩萬塊一個月。她說，那裏死人比活人多，還到處都需要修，有甚麼好。想了想她又說，不過那裏有我最開心的日子，也有我最難過的日子。

抗戰勝利後，十二歲的母親跟她父母、妹妹、外婆、奶奶在這棟房子裏過上了安穩的日子，那時候她還不能預見生活將給她的磨難和這棟房子裏將會發生的變故。

母親回憶起老房子的時候說「我們 9 號」，難道她連老房子的地址都忘了嗎？很小的時候——那幾乎是我人生的第一記憶——母親教我背誦「我叫陳沖，我爸爸叫陳星榮，我媽媽叫張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 170 弄 10 號」。在那些動盪的歲月，這句話讓我安心——我知道自己是誰，我有歸屬。母親得健忘症好幾年了，不管她說甚麼我從來不糾正她，可這次我忍不住提醒她我們家是 10 號，不是 9 號。沒想到她記得很清楚，耐心跟我解釋道，10 號是後來的事，本來顏福慶為上海醫學院十位海外回來的教授，蓋了十棟樓，抗戰結束我們從重慶搬回來，住 9 號。很多

年後加蓋了一棟小房子，成了新的 1 號，我們就由 9 號變成 10 號了。那時候，閣樓都是通的，幾棟房子裏的小孩，就跟老鼠一樣從一家鑽到另一家，很開心的。

母親慢悠悠地回憶起當年住在那裏的每一戶人家：1 號是肺科吳紹青；2 號是生理朱壬葆；3 號是生理徐豐彥；4 號是病理谷鏡汧——「文革」期間他自殺了；5 號是生化林國豪；6 號是內科林兆耆；7 號是五官科王鵬萬——我家小貓喉嚨裏卡了魚刺就是王醫生戴了額鏡用鉗子夾出來的，王太太是我的鋼琴老師；8 號是胸外科黃家駟，我得肺結核就是黃醫生為我動的手術；我們家住 9 號；10 號是沈克非一家，跟我們特別要好，沈教授從美國帶回來一輛汽車，禮拜天開車跟兒子女兒去衡山路國際禮拜堂做禮拜，他夫人不大去，他就把我帶上。那時候不搞政治運動，鄰居間關係很親密，每天晚飯前大家出來在草坪上小聚，散步聊天……

講到那片草坪，我的眼前又浮現出兒時的自己，在草坪上跳繩、踢毽子、打球、捉迷藏、打架。到了傍晚，各家大人在窗口大聲呼喚自家的小孩吃晚飯，孩子們好像退潮那樣跑回家，草坪上瞬間空空如也，只剩下被孩子們踩扁、碾碎了的青草，在夕陽下散發出淡淡的清香。

記得政府提倡綠化那年，草坪上便種滿了樹。一過了黃梅天，所有樹幹都繫上繩子掛滿了棉被。日落時，人們捧着曬了一天的被子，把臉埋在裏面聞太陽的味道。如果幸福有一種氣味的話，梅雨季後第一天陽光照射過的棉被的味道，也許就很接近了。

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之後，弄堂裏開始備戰備荒，每家每戶出人出力，在草坪上繞開了樹、彎彎曲曲挖了一條壕溝。可惜挖了才一米多深就見



這裏是原來的廊亭，但「文革」時搬進客廳的人家把它改建成了兒子的房間，廊亭和花園之間就有了我身後的牆。那之前在廊亭拍照都是面朝花園，唯有這天拍的背對着花園。這條蕾絲長裙，是我跟隨中國電影代表團到日本訪問時帶回來的。為甚麼在這天的每張相片裏我都拿着塊毛巾，還是抹布？身邊那麼厚重的是本甚麼書？它正好在那兒，還是被特地擺在那兒的？我一點也不記得，但看到從花園溢進窗來的光，灑在我的頭髮、臉頰、胳膊上，看到它灑在廊亭的瓷磚地上時，我感到一種強烈的懷舊情緒將我淹沒……

水了，壕溝變成了我們打水仗的地方。為了預防腦膜炎的氾濫，街道領導便定期在壕溝裏噴滴滴涕滅蚊子。後來，大家被召集起來壘磚，把挖出來的泥揉成麵糰的樣子，放到木頭的模子裏做成磚的形狀，在太陽下曬乾，再搬上一輛卡車。聽說是運到附近的火窯去燒，燒好了用來造肇嘉浜路下面的防空洞。

我問母親，還記得 170 弄草坪上挖壕溝備戰的事情嗎？她說，記得啊，那時大批國民黨部隊集中到上海，弄堂裏進駐了很多士兵。我意識到，她的失憶症讓她把我的少年時代和她自己的少年時代混淆了。

母親接着說，夜裏，排長和連長們睡在各戶底層的一間屋內，士兵們都擠在房子南門外的廊庭上。白天，他們就在大草坪上操練，我和妹妹常去看，那些兵都是剛抽來的壯丁，完全是沒受過訓練的農民，連立正的姿勢都擺不正，一聲「向右看齊」腦袋就亂晃，喊到「向右轉」「向左轉」時更亂了套，排長就拿大刀拍打他們穿着棉褲的屁股。他們只被允許在我家後門外的一個水池用水，樓下廚房邊的一個小馬桶間讓他們用，聽說有一個小兵在抽水馬桶處淘米，水一沖米都沒了。每當開飯時母親就看到兩個士兵抬來一口大鐵鍋，放在草坪上，掌勺的給排隊的士兵們舀兩勺稀裏光當的湯菜和米，十分可憐。我們樓下住了一個排長，他有工資，可以上街買飯吃。這個排長帶着一條大狗，吃睡都在一起，那狗已隨軍多年，名叫查理。士兵們住了不到一個月就要開拔赴前線，臨走前排長就把查理給我們留下。他說，牠就不要跟我們去當炮灰了，讓牠給你們看大門吧。待部隊開走後，大院子裏空空蕩蕩的，查理守着那間屋等排長歸來，誰知左等右等不見回來，晚上牠就跑到大草坪中央對天哀鳴，那聲調十分淒慘。我們怎麼呼喚牠，牠都不理，天天如此。安媽媽（我姥姥）說，

我們要防的就是那些退下來的殘兵敗將，而牠偏偏跟所有穿黃軍服的人親，看門是不管用了，養又養不了，還天天哭嚎。說完就把牠送到上醫動物房去了，到了那裏就凶多吉少了。

母親不記得幾分鐘前說過的話，但是七十多年前的事卻記憶猶新。她輕輕唱起一首英語歌，像一個被自己頭腦驅逐出境的人，悄悄潛回了那曾經熟悉溫馨的河畔。

You belong to my heart
Now and forever
And our love had it's start
Not long ago

We were gathering stars
While a million guitars
Played our love song
When I said I love you
Every beat of my heart said it too

It was a moment like this
Do you remember
And your eyes threw a kiss
When they met mine

Now we own all the stars
And a million guitars
Are still playing
Darling, you are the song
And you'll always belong to my heart

母親居然唱得一字不落，充滿着永恆的渴望。唱完後她害羞地說，那時候才那麼小，就唱這種「黃色歌曲」。接着母親聊起兒時的兩個玩伴安妮和弗蘭克，這首歌是在他們家聽唱片學的，那是他們最愛的歌手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唱的。安妮和弗蘭克的媽媽是美國人，他們後來回了美國。

我想起來了，小時候我對 2 號（原 1 號）裏的外國老太太很好奇，我幾乎從來沒看見過她，因為她白天不出門。有時晚飯後，她會跟丈夫到院子裏散一下步，手總是挽着男人的胳膊。備戰備荒那陣，里弄裏經常有防空演習。有一次演習我們幾家人擠在不知誰的一間房裏，那是我第一次在光線下看見她的臉。窗簾關着，當時的黃色染料腐蝕性強，窗簾布上的黃花變成一個個小洞，陽光一束一束從洞眼裏鑽進來。她坐在那家的床沿上，蒼白的皮膚好像是透明的，深凹的眼眶裏眼珠是灰色的，高聳的鼻樑像是一把尖利的武器。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她。屋裏的幾個孩子開始互相推來推去，一個壓低嗓門說她來抓你了，一個尖叫，一個大笑。她默默地承受着，身旁的丈夫也不作聲。

她怎麼會在這個跟她格格不入的地方，一待就是一輩子？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個美國女孩嫁給中國人是駭人聽聞的事吧。她是跟家庭決

裂了才跟着一位英俊的中國醫生遠渡重洋來到我們中間嗎？甚麼樣的激情才能給人這樣決絕的勇氣？在那些無比艱難的歲月裏，她後悔過嗎？我想像，她一定也跟我一樣，無數次在夢裏回到她大洋彼岸的祖屋，徘徊在她童年的樹林……

二十歲的時候，我也背井離鄉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度，像是被孤身放逐到月球上，回程遙遙無期。那年，我的信仰死亡了，愛情也死亡了。絕望的時刻，總是記憶中母親的聲音融化我內心的冰川：「我叫陳沖，我爸爸叫陳星榮，我媽媽叫張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 170 弄 10 號。」這句話提醒我生命的歸屬和牽掛，責任與使命，它把我帶回夢鄉裏的房子——籬笆上紫色的喇叭花，花園裏瘦瘦的枇杷樹，窗沿上種的青蔥的紅瓦盆，和瓦盆邊熟睡的三花貓，曬台高牆上騎着的男孩女孩，還有他們仰頭看煙花的臉、眼睛裏的光彩……

朋友發照片來的時候問，要不要哪天帶你回那裏懷懷舊？我說不用去了。人回不了家並不是因為距離，而是因為歲月，人回不了家就像他回不到母親的腹中。在幾十年流浪的日子裏，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我也沒見過一棟如它的黑瓦白牆房子。

你看過《金瓶梅》嗎？

在我出生前，我家後門的牆外原來是上海的一條運河，叫肇嘉浜，浜上有許多座橋，我家在楓林橋邊。

北洋政府時期，第六混成旅旅長何豐林被任命為淞滬護軍使，成為上海最高軍政首腦。那時肇嘉浜以北為法租界，以南為中國地區。他到任不久就在鄰近的交通路（現平江路）兩側蓋起了幾棟西式樓房，「護海道尹公署」「外交部特派江蘇交涉員公署」相繼遷入辦公。又籌銀徵地在肇嘉浜以南修建了一條通向沈家浜路（現醫學院路）的馬路，並在肇嘉浜上建造了一座橋，以何豐林的名字將這一橋一路命名為豐林橋、豐林路，這一帶遂為上海華界的政治中心。

一九二七年奉系張作霖在京成立安國軍政府，隨後上海特別市市政府成立，市政府就設在交通路舊道署內，年底就將交通路改為市政府路（解放後改為平江路），豐林路改為楓林路；一九三〇年代市政府遷移江灣後，市政府樓和它西面的外交大樓轉讓給上海軍醫事業委員會；上海淪陷時期，這裏曾為汪偽政府辦事機構的一部分，也曾是一個血腥的屠

殺場地；抗戰勝利後，這裏成為上海醫學院的生活區，市政府樓成為上醫幼兒園，而外交大樓則為家屬院。

我家的地址雖然是平江路 170 弄，但是附近幾條街的人都稱我們弄堂為「外交大樓」。弄堂口有兩扇大鐵門，大門左面的小平房裏面，住着一個瘋子，他經常圍着院子自言自語地疾走，病重的時候，就被綁在門前一棵大樹上吼叫掙扎，令我膽戰心驚。

大門右面的小平房裏，住着看門的「老寧」（上海話老人的諧音），他骨瘦如柴，沒有人知道他的歲數。母親小時候就稱他為老寧，我二十四歲從美國回到闊別四年的家，頭一個見到的仍然是老寧精瘦的面孔。朝思暮想的院子被違章建築搞得雜亂無章，但老寧依舊。難道他在我們一代人不知不曉中活了幾百歲？像古希臘奧林匹斯山上的神，守護着這個日益破敗的院子。

門房間裏有個傳呼電話，我至今能聽見老寧洪亮的嗓門半夜三更在窗外喊我父親的名字，父親就騎腳踏車到華山醫院去處理急診病人。每次去，他可以吃一碗醫院補助的麵條，偶爾他一個晚上被叫去兩次，他就帶一個鋁飯盒，把麵條帶回來給我和哥哥第二天吃。

大門正對着外交大樓，裏面住了幾十戶人家，大多是上海醫學院和中山醫院的工友和護士。大樓前有一片帶坡度的柏油空地，那是我們進出弄堂常常走過的地方。我記得在那裏學騎腳踏車，父親把着腳踏車座跟着車跑。我的腿太短，只能站着蹬腳踏板，下坡的時候失控了，撞倒一位白淨的老護士。我和父親扶起她，攙她回家。她和另一位老護士住在外交大樓一層的一間房。家裏有一張雙人床，一個小方桌，兩把椅子，還有衣櫥和五斗櫃。我留心到櫃子上有幾張她倆年輕時的合影，看上去親如

母親說我出生的第一二個月日夜顛倒，白天不停地酣睡，夜裏不停地哭鬧，父親總是半睡半醒地抱起我唱「姑娘你好像一朵花，美麗眼睛人人讚美她……」，然後氣都不換就咬牙切齒地罵「再哭我把你丟到外面去！」



母親還說我不到兩歲就會說不少話了，只是發不出L的音。我喜歡一個人搭積木，大人叫妹妹過來時，我總是說我沒空，大人就哄我說給你好吃的，我便馬上改口道我來了，把「來了」說成「YAI YE」。有一次，不知甚麼食品不小心掉到地上，母親說，髒了，不能吃了。我一把搶過來塞進嘴裏，說，這麼好吃的東西，掉到陰溝裏我也要吃。原來我的嘴饞和對獨處的需要都與生俱來。



姐妹。弄堂裏的人傳說這兩個「老小姐」終身未嫁，共同生活了一輩子。十幾年後我在美國第一次接觸同性戀的朋友時，突然想到她們——一個握着另一個的胳膊，輕輕地擦紅藥水——那相濡以沫、相依為命的樣子歷歷在目。

柏油地的南面有一個水泥砌的垃圾池，那時候的人甚麼都捨不得扔掉，全弄堂六十幾戶人的簸箕滿了都倒在那裏，還綽綽有餘。垃圾池邊上有一個「泔腳鉢頭」，裏面是淘米水、菜皮、魚肚腸之類。每天有一個單車上捆着兩隻大桶的人，來把泔腳鉢裏頭的東西拿回去餵豬。回想起來，我們那時候就已經懂得把乾垃圾和濕垃圾分開。

垃圾池和外交大樓之間有一口井。晚飯後，孩子們圍在井邊，把西瓜放在尼龍網兜裏，拴在繩子上放到井水裏去冰。那時代，西瓜是稀有物，發燒有醫生證明才能買。記憶中，我也多次端着板凳坐在井邊，有時是為了看護自家的西瓜，但更多的是去那裏聽大孩子們講鬼故事，心甘情願地把魂嚇掉。成年後我有機會讀了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發現其中都有些令人驚嚇的，甚至描寫邪惡的段落，我才明白我們當年也是用敘事來間接體驗「負面」感情，從而調節和把握人類原始的恐懼感。

離井不遠的一扇窗戶裏，總是飄出優美的琴聲。那家兩個已成年的兒女一個彈得一手好鋼琴，另一個拉得一手好提琴。我有時會去那裏，跟他們的母親老關學英語、學打字。老關是澳大利亞出生的華僑，她丈夫老葉當年在澳洲留學，回國時把她帶回上海。老葉在「文革」時期衝撞一輛迎面開來的公共汽車，企圖自殺，結果丟失了一邊的肩膀和手臂，他的脖子不能轉動，腦袋總是倒向一邊，樣子很可怕。有一次我去找老關，正好她不在家，老葉讓我坐下等。他用牙扭開一瓶藥，然後跟我說，他已經不

存在的肩臂，覺得劇烈疼痛。這叫 phantom pain，幻肢痛，他咬着牙教我這個詞。

我家的房子跟葉家是同一排連體洋房，他們在 7 號，我們在 10 號。隔着草坪也有同樣的五棟連體洋房。原來十棟房子住十戶人家，「文革」開始後，一下子搬進來好幾十家，到處加建水管、水槽、電線，連抽糞車都比之前來得頻繁。化糞池在兩棟房子側門之間的地底下，地面上可以看到四個直徑半米的圓鐵蓋，封得很嚴實。

傳說有人為了躲避抄家的紅衛兵，半夜裏把金條用塑膠包好偷偷丟到了糞池裏。上醫領導知道後，抽糞車就來了。記得那是穿棉襖的季節，一個明亮的晴天，糞車邊上圍滿了人。抽完後，一個穿着橡皮衣服和套鞋的人拿了手電筒跳進了糞池，我們幾個孩子擠到洞口去看。一會兒，那人爬上來說，沒有找到金條，但發現一隻金戒指。一個鄰居遞上一團擦腳踏車用過的紗頭，我看見擦過後的金戒指在陽光裏一閃，上面刻了波浪。

我跑上樓把金戒指的事告訴姥姥，她聽了以後說，那是新郎新娘互相戴的婚戒，象徵他們從此屬於對方。那時中國剛剛成功地製造了第一艘遠洋輪。二姨從銀川寄回上海的信封上，有一張藍白版畫式的遠洋輪郵票。高大的船頭下面一捲捲的浪花，看上去跟戒指上的圖案一樣。婚戒和遠洋從此在我腦中連在了一起，成了我對未來懵懂的憧憬。

十多年後，我跟 N 沒有舉行婚禮，沒有交換婚戒，更沒有出行遠洋。我們在離洛杉磯不遠的沙漠之城度過了新婚夜，因為那裏辦理結婚手續最快捷簡便。婚後不久我到澳門拍戲，他飛來現場探班，一到就去了酒店的賭場。次日凌晨我聽到開門聲，接着他疲乏的腳步聲向我走來。一會兒，我的手被輕輕拉起，一隻冰涼的戒指被戴到我的無名指上。我睜開一線眼

睛，六顆白鑽進入焦點。他俯身在我耳邊溫柔地說，我為你贏回來的，呼吸裏散發出一股威士忌酒味。朦朧中，我感到一股悲哀，少年時代對婚戒的美妙幻想已經蕩然無存……

在糞池裏發現金戒指那一年，我家的房子裏搬進來五戶人家。每家每戶放在廚房裏的醬油、老酒、菜油的瓶子上，都畫了線，記錄每天用掉多少，別人如果偷用，馬上可以察覺。

客廳裏搬來一家蘇北人——父母、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他們經常爭吵，還罵髒話，但日子過得生龍活虎。我喜歡偷看他們的舉動，偷聽他們的對話，偷聞他們廚房裏的味道。有一次，他們一下子煮了好幾鍋黃豆。我心想，這麼多，吃不完餓了多可惜啊。這些黃豆的命運，變成了我在那幾個禮拜最關注的事情。接下來，它們被碾碎，拌了鹽和別的甚麼佐料，又被裝進兩個開水燙過的罈子裏。然後，好些天都沒有黃豆的蹤影，我心裏充滿疑惑。終於有一天，罈子又出現了，裏面的黃豆都長了白花花的毛，一股又香又臭的氣味充滿了整棟房子。他們一家人有說有笑，把黏糊糊的霉黃豆捏成一塊塊的餅，放進竹匾裏在花園裏曬。後來我從他們家小女兒那兒打聽出來，他們原來是在釀製鮮醬油。

飯廳裏搬進一家三口，進門出門、燒飯上廁所都低着頭。沒人知道他們的姓名或者職業，沒人看見過他們的眼睛或聽見過他們說話，就連小毛頭都似乎沒有哭聲。後來他們家一個崇明阿婆也搬了進來，在廚房裏帶孩子，我總是看見她把飯菜放在嘴裏嚼得很爛，再吐出來放到小毛頭的嘴裏，覺得她不懂衛生。

一層的臥房原來是我哥哥的房間，「文革」開始後他被送到徐家匯奶奶爺爺家，那臥房一度成了上醫革命造反派司令部。後來司令部搬走了，

廊亭。左一摟着我的是姥姥，姥姥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還有一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右二摟着我哥的是她姐姐。我對她沒啥印象，只知道是嫁去了廣州。但我哥的記憶裏，大姥姥是個雪中送炭的人。上海少年划船隊去廣州集訓時，他每天都去大姥姥家，補點額外的營養。後來再大些，他去海南島采風畫畫，當年海南極其貧困，有錢也買不到吃的，把他和同去的兩個人都餓得發慌。回程他們去了大姥姥家，把院子裏的三隻雞都宰來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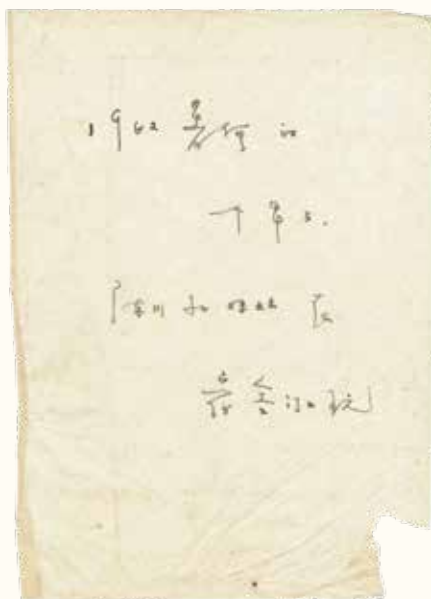
住進來一戶寧波人家——夫妻、小孩和阿婆。有幾回我看見阿婆送給姥姥寧波帶來的莧菜梗。姥姥平日從來不跟搶房子進來的人打交道，但她還是收下了寧波阿婆的禮物。她垂涎一切發酵過的臭食品。

樓下三戶加上亭子間的人家，合用樓下的廁所和樓梯口的暗廳，他們都把自家不怕偷的東西放在那廳裏佔地盤。蘇北人和寧波人兩家，經常為這些合用的空間吵得不可開交。有一次兩家打了起來，一陣打罵後，蘇北人家的二姐和寧波人家的媳婦，一個揪頭髮一個咬耳朵僵持住了，誰也不放過誰。我和哥哥站在樓梯上往下看，黃黃的電燈泡下，只見頭髮從頭皮上被生生揪下來，鮮血從耳朵根流下來滴到地板上，驚心動魄。

住進亭子間的是一個護士，她的個子跟我這個六七歲小孩差不多高。這讓我有點困惑，就問她，你是大人還是小孩？她不回答我，只是透過厚厚的眼鏡片瞪住我。看到她嘴唇上方的汗毛很濃重，我便認定她不是個小孩。很快，她結婚了，但丈夫很少在家，每個月只來住幾天。這個丈夫每次來都帶着板鴨、火腿、鰻鯊、筍乾等稀罕食品，掛在我們樓上晾衣服的竹竿上，兩三天後那些東西又都不見了。父母議論他是溫州來滬跑單幫的，跟這個護士結婚就是為了在上海有個落腳點。後來護士大了肚子，爬那半層樓梯回家變得越來越艱難，每次丈夫回來她都要罵他，開罵前總是大聲叫他：「同志啊！」

最後搬進來的是一對醫生，住下不久生了一個女兒。他們佔用的是姥姥跟外公一起住了二十年的主臥室，帶有單獨衛生間和一隻大壁櫥。姥姥搬出那間房間後一直失眠，晚上吃了安眠酮就口齒不清地在這間房門口，詛咒這家人的祖宗十八代。有時她會服了藥之後去浴缸裏泡着流

1962 年暑假的一個早上，陳川和妹妹在宿舍門口玩。



淚，好像只有在這種半清醒狀態下，她才可以自由地悲痛。媽媽總是拿着毛巾和衣服，半抱半拖把她送到床上。

那以後的幾年裏，家裏有一位常客。我下課回家，就看見他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床沿鋪着花毛巾，母親矜持地坐在另一端。這間屋本來有一個陽台和兩扇寬敞的鋼框玻璃門窗，但是陽台被封起來給哥哥用了，房間裏面就變得很暗。他們坐在曖昧的光線裏，不說甚麼話，一坐就是個把小時。有幾次，我進屋，他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按在他的膝蓋上，緊緊地摟着我，撫摸我的身體，貼着我的耳朵說，長大了一定要跟他兒子結婚。我雖然還小，但是本能地懂得他的觸摸是猥褻的。我僵硬地坐在他的膝蓋上，忍受着，等着母親說，妹妹去做作業吧；或者，妹妹去曬台收一下衣服。有時候，這位叔叔的兒子也跟着來我家，母親總是讓哥哥教他畫畫。我們都知道，叔叔是母親的領導，是可以保護她的。

外公因是畏罪自殺，家屬得不到任何津貼，姥姥被打成反革命後，也停了薪水，每個月只有幾塊錢的生活費，我們的家境變得很拮据。母親和姥姥都不會過日子，心血來潮的時候，母親會去買話梅、桃瓣、醬芒果乾；姥姥也會買椰子醬、麵包、烤子魚罐頭那樣的奢侈品，經常是到發工資前幾天就維持不住了。這種時候，母親和姥姥就會互相責怪、爭吵。吵架開始都是為了菜錢，但是很快就變成了母親對姥姥的控訴：「我才五歲啊，你就把我丟給人家，自己去了英國，我吃蛀掉的米，褲子破了用書包來擋，後娘都不會這樣對孩子啊……」那段幼年的不幸被母親多次提起，每次吵到這個地步姥姥就只好不響。

有幾回，在沒錢買菜的時候，我不知道從哪裏學會了用糧票去跟人換

雞蛋。印象裏那人像農村來的，雞蛋放在一個竹籃子裏，上面蓋着破毛巾。老保姆被送回鄉下老家後，我開始掌廚。那時我大概十一歲，還在長個兒，周圍的煤氣灶、水槽、刀砧板都顯得很高。每天早上，我把米淘好。中午一下課就把書包往背後一推，開始燒飯。我能把很小一塊肉切成很細的肉絲，炒一炒，再把大白菜放進鍋一起煮爛，勾芡後放味精，就是一大鍋很香的「爛糊肉絲」。我還能把一根很細的帶魚，做成兩大碗「苔條麵拖帶魚」，分兩頓飯吃。弄堂大門外的水果攤上，常有爛掉了半個的蘋果或鴨梨。我總是會很便宜地把它們買回家，去掉爛的部分，切成小塊，用糖精和藕粉做成水果羹。這些都是我非常樂意做的家務，但是我痛恨洗碗和一切廚房的善後工作。這些全都推給哥哥去做。哥哥畫畫，需要我做模特兒，我常用洗碗作為交換條件，同時還要求他，必須把眼睛畫得比實際的大。

哥哥天性敏感，從小熱愛美術、詩歌，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把畫畫好。但是為了避免畢業後插隊落戶，父親逼他參加過游泳隊、水球隊和划船隊。硬是把一個文弱的男孩，練成了一個渾身腱子肉的少年運動員。哥哥所在的划船隊，每天在長風公園訓練。有一天，他在湖裏逮了十來隻蛤蟆，回來後放在澡缸裏。牠們長腿、大眼睛，醜得可愛，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把牠們做成菜。母親到家後，站在澡缸邊看了一會，然後回屋拿了一把剪刀。她抓起一隻蛤蟆，拎着牠的腳往澡缸邊上狠狠一甩，看牠不動了，就在嘴上剪開一個口，拽一把，整張皮就撕了下來。

我不會忘記母親那天的手，她的動作自信、簡練，好像這是她每天在做的事情。澡缸後上方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漸暗的天色裏，蛤蟆在搪瓷上徒勞地趴着跳着。母親緊閉着嘴不說話，只聽到蛤蟆和澡缸暴力相撞的啪啪聲和撕皮的刺啦聲。



我小姨在協和醫學院上學時「文革」開始了，畢業後她和丈夫被分配到了青海澤庫。那裏貧窮，海拔又高，漢族人的新生兒很難存活。我十二歲時，小姨回上海來生下表弟高冬，過完滿月就離開了。當時我還不懂，這是多麼悲痛欲絕的撕裂。沒有了母乳以後高冬只好喝牛奶，也許因為過敏，他長了一身奶癬，難受得厲害，老哭。姥姥讓我幫手哄他，我經常很不情願。他長大一點以後，每次陪姥姥上街都會主動幫她拎東西，在公交車上，也總是能憑他的機靈為她搶到座位。高冬進入青春期的後，姥姥說管不了他了，就把他送去了一個住讀學校。母親留了一封高冬十二歲時寫給姥姥的信，「……三個包裹全收了，第一雙棉鞋太小，給邦阿姨（我二姨）了，又匯錢去買了一雙，十分合腳。現在德州很冷，我穿你做的那件大棉襖，邦阿姨又給我做了棉褲，還把張沖姐姐的翻毛皮鞋給我穿了，十分暖和。今年手凍得不太厲害，就是腳開始凍了。邦阿姨給我買了一個軍帽，剛好」。如此普通的信四十多年捨不得扔，是怎樣的牽掛、心痛或者內疚？

現在我也為人母，可以懂得，母親面對蛤蟆時的勇敢和無情其實是在給我做榜樣。她總是有意無意地抓住一切「可教育時刻」，教我去學會生存的技能。大概在我十二歲的時候，母親教會我打靜脈針。那年，她接到了一項重要科研任務——從神經藥理的角度，尋找針刺麻醉的鎮痛原理。實驗室有動物房，我喜歡去那裏撫摸頭皮裏埋了電極的小老鼠和大白兔，還有狗和猴子。星期天早上，母親常帶着我用水管沖洗猴子的籠子，然後把糞便清掃掉。有一次，我們發現水管不見了，前後左右找不到，好半天才注意到，幾個猴子不知怎麼把管子鉤到了籠子裏，然後一起坐在上面，顯然是不想讓我們用水沖牠們。母親笑起來，誇那些猴子聰明。那天，她打開一籠做過實驗後廢掉的小白鼠，抓起一隻，給我看牠半透明的尾巴裏的四條血管，然後把着我的手，教我把針頭扎到靜脈裏，再把針筒往回抽一下。她說，你看到回血就是扎準了，現在注射空氣進血管，小白鼠就猝死了。

幾十年後在大洋彼岸，我被送到醫院做緊急剖腹產，那是我這輩子頭一次打靜脈針。針頭扎進血管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在我手裏痙攣的小白鼠，眼睛盯着輸液管，衝着護士大叫：「裏面有氣泡！」

許多當年母親教給我的科學常識，像是寫在我眼皮底下的課本，合上眼我就能看見它。有時候，我留意到自己跟女兒們重複我母親的話。比方說，洗青菜要洗完了再切，先切後洗的話，會丟失太多的維生素；想要青菜出鍋時是綠色的，鍋蓋就只能蓋一回，揭開以後再蓋上一定會發黃；煮乾豆類的時候先不要加鹽或糖，這樣才容易煮爛；還有，洗髒衣服用水泡是沒甚麼效果的，需要重複擠掉髒水倒入清水，洗滌就是通過這樣的交換完成的。

最難忘的常識，是關於水和油。我剛開始炒菜的時候發生過一個事故，我把油倒進了一個濕的炒鍋，結果臉被滾燙的油濺到。母親嚇壞了，拿了筆和紙，跟我仔細解釋了水的分子和油的分子、水的沸點和油的沸點的區別，說明為甚麼鍋子必須是完全乾的才能把油倒進去。在母親眼裏，炒菜於我變成了一件極其危險的事，她最大的恐懼就是我的眼睛會被油爆瞎。後來我到美國留學，母親給我的每一封信裏都要加上「炒菜要小心，油不要濺到眼睛裏」。那些年我面對的人生危機母親無法知道，她只能茫然地擔憂，而眼睛被滾油爆瞎這樣危險的事，象徵着一切可能發生在她女兒身上的邪惡。

母親雖然喜歡教我科學常識，但是對我青春期身體的變化隻字不提。那段時間我喜歡打乒乓球，上學的時候總是把一塊乒乓球拍藏在罩衣下面，拍柄掖在褲腰裏。有一天，我感覺到球拍觸到胸口時很疼，意識到那裏長了兩個硬塊，以為自己生了甚麼病。又過了一陣，胸就鼓了起來。有一天，在田徑課跑步的時候，我突然發現男老師盯着我跳動的胸脯，臉唰的一下紅到耳根。回到家，我就把穿不下的方領衫，修剪縫製成勒胸的內衣，勒到喘不過氣來才放心。

那個愛趴在窗前發呆的妹妹，越過一段尷尬的年齡後，長成了一個含苞待放、明眸善睞的少女。那段時間，我總是在等着隔壁鄰居家一個鬍鬚男孩回家。每次在窗口看到他，我就飛速拿起羽毛球拍衝下樓，氣喘吁吁跑到他面前，假裝這完全是巧合。有一次母親正好踏車過來，看見我和男孩在說笑，就把我拉了回家。她嚴厲地說，他是個吊兒郎當不愛學習的小流氓，你還去跟他胡調情，以後再也不許做這種事了。我不知道「調情」和「這種事」是甚麼，但它們讓我聯想起，在姥姥的《匹克威克外傳》



插圖裏面，有一張是男人和女人在一條公園長椅上嘴吸着嘴，每次翻看都讓我感覺暗流湧動。我直覺「調情」和「這種事」都是羞恥的、罪過的，是我不應該做的事。

這樣的慾望和抗爭，就是從亞當夏娃延續下來的原罪嗎？為甚麼在所有的文明裏，都有對這個最自然的慾望的禁忌？人類是為了征服慾望，而創造了輝煌的精神世界嗎？所有的藝術不都是慾望的昇華嗎？還有愛情，它又是甚麼？是上帝送給慾望的禮物嗎？

十四歲那年，我在房子後門的通道，養了幾隻毛茸茸的小雞，樓下蘇北人家的兒子在那裏搭建了單槓、雙槓和啞鈴。餵雞的時候，我常看見他

跟幾個同伴一起光着膀子練肌肉。他比我大四歲，我們很少接觸，幾乎沒說過甚麼話。有一天我在那裏剝蠶豆，他蹲下來幫我一道剝，沉默一會兒後他問，你看過《金瓶梅》嗎？我說沒有。他說是禁書，我可以借給你。那天晚上，我問姥姥，你看過《金瓶梅》嗎？姥姥變得警覺，說，你從哪裏聽來的？我說是樓下那家的兒子，姥姥的臉陰沉下來，說，你少跟他搭訕。

過了幾天男孩跟我在他家門口遇見了，他說，我去給你拿書。我說我不想看了。我們站在黑暗的樓道裏半天沒有動，我聽到他的呼吸，然後感到他的手輕輕觸了一下我耳邊的頭髮。就在這個時候姥姥不知從哪裏冒了出來，劈頭蓋臉把我罵了一頓。現在回頭看，姥姥和他家是不共戴天的。他們霸佔了我們的房子、毀壞了我們的生活，現在他家的兒子又來勾引她的外孫女。但當時我還不懂這點，覺得非常委屈。第二天，他一見到我就說，你不用怕那個神經病老太婆。說着，就把我拉進了他家的廚房。那是由原來用人的小廁所改建的廚房，在煤氣灶、刀板和碗筷架當中只夠站一個人。我們進去後他關上了門窗，沸騰的飯鍋、湯鍋冒着蒸汽，我們的身體擠在一起。時間凝固了，不記得過了多久，我們有沒有說話，只記得他把嘴貼到我的嘴上，用舌頭舔我的舌頭。我最先想到的是這太不衛生了，母親從小教我，不要用別人喝過水的杯子或別人用過的筷子，會被傳染肝炎的。但他的手抱着我的頭，不容置疑地吸住我的嘴唇。我的第二個念頭是，完了，這下要懷孕了。緊接着我想也許這就是大人說的訂終身了？我困惑地從他懷抱裏掙扎出來，頭髮被蒸汽和汗水弄得濕漉漉的貼在臉上。

那個夏天我時刻想着他，也時刻迴避着他。那時候我們每家每戶都有一根自製的殺蚊武器，它是我們用一塊破被單或舊衣服，包在一坨廢

棉絮、爛襪子之類的東西外面，再綁到一根竹竿的頭上，用它來摠死停在天花板上的蚊子。傍晚，蚊子氾濫的時候，我躺在剛剛拖過的濕地板上，企圖背英語單詞，聽着樓下他咚咚咚捅房頂的聲音，心如亂麻。好在不久他就插隊落戶去了，我也進了上影廠的《井岡山》攝製組。

很長一段時間我沒有再想到過他，直到在他鄉第一次與男友接吻那一刻，小廚房蒸汽裏那些細節出現在我眼前，一股濕乎乎的鄉愁湧上心頭。

「一號人物」

我從小臉皮薄，羞於在人前流露感情，還懼怕人群，不是一塊演戲的料。如果在我十四歲的時候，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武珍年導演沒有偶然地出現，我今天會在哪裏？那時「文革」快結束了，高考也快恢復了，也許我會按照前輩們的腳印，步入科學事業？那似乎更符合我的個性。

女兒們還小的時候，我每天跟她們一起看《海綿寶寶》，有時我會走神，幻想那個海底的大菠蘿裏，是我的海洋科學研究室。成群的小魚像銀色的雨點那樣圍繞着我們閃爍，千姿百態的海綿、海星和珊瑚在我們的周邊棲息。我和幾個志趣相投的同事，為發現了某種奇特的浮游生物而激動不已。也許這個發現很重要，說不定可以解決地球溫室效應的難題。但真正令我們心曠神怡、如癡如迷的其實只是海底本身——那個永遠夜幕低垂的世界，和它無窮無盡的奧妙。世人完全不在意我們，但是我們對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毫無疑問。那是多麼幸福的人生。

然而，命運向我打開了另一條道路，它跟海底大菠蘿裏的實驗室一樣令人難以置信。我居然成了電影演員。仔細回憶起來，有這樣一件事：十四歲的一天，在看了電影《春苗》之後，我跑到母親大衣櫃的鏡子前，

對着鏡子模仿李秀明說電影裏的台詞。也許那份莫名的衝動，就是我未來樂章的第一個音符。

那時候每個星期天，我們一家都會到奶奶爺爺家吃午飯，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星期天，改變了我的人生。那天，上影廠的武珍年導演通過我姑姑的一位朋友，來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見到過一張父親為我照的相片。印象裏她沒跟我多說甚麼，也沒有留下吃飯就走了。幾天後她通知我去上影廠面試，不過那時還沒有「面試」這個講法。武導演只是說，去廠裏讓其他人也見見你吧。

記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節，上海人稱「兩用衫」，就是春秋兩用的衣服。我一共有兩件兩用衫，一件軍裝，還有一件淡色帶粉紅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廠之前，母親、姥姥和我反覆討論了兩件衣服的利弊：軍裝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釘子鉤破打了補丁；娃娃衫可愛，但是缺乏無產階級艱苦樸素的風格。最後決定「不愛紅裝愛武裝」。

到上影廠後我被領到一間辦公室，裏面站着、坐着五六個大概是副導演的人。我從來沒有被人這樣審視過，但是勇敢地抬頭看着他們。初生牛犢不怕虎也許就是我那副樣子吧。其中一位問，有甚麼可以為我們表演的嗎？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卻把我問住了。小學期間我是學習委員，課餘愛好是打乒乓；中學我是射擊隊的運動員，還負責出黑板報，實在沒有可以拉出來就表演的文藝節目。尷尬了一會兒後，我說，我為你們背誦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吧。周圍的人也許有點吃驚，都沒反應。我又加上一句，用英文。不知道這個想法是怎麼出現在我腦子裏的，沒等他們回答，我就朗朗地開始了。那時我和母親每天準時開無線電聽「廣播英語課」，《為人民服務》也是那樣學了以後背下來的，我非常引以為豪。我無



法想像在場的人對我的表演是怎麼想的，我只知道我就這樣被選中去演電影《井岡山》裏的小游擊隊員。

攝製組到共青中學去借調我的時候，副導演和製片主任順便看了看學校的其他女同學。老師為他們推薦了學校講故事組的一位同學，她有很大的眼睛，上面長了濃密的睫毛，還會說一口比較標準的普通話。我突然覺得受到威脅，失去自信。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這個職業給我造成的自卑感。我永遠覺得自己不夠好，是偽劣品。或許，這份不安全感是與生俱來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時鞭策我。回頭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在企圖把自己從偽劣品變成真貨。

《井岡山》是江青親手抓的「長征三部曲」當中的一部電影，所有演員和工作人員的檔案都需要她通過，演男主角的朱時茂是她定的，導演成

蔭也是她從八一電影製片廠調來的。第一次見成蔭導演，我坐上了他的紅旗牌轎車，車窗上薄薄的窗簾半關着，我從一個完全陌生的視角和構圖望着街上劃過的腳踏車和行人，懷疑自己在做夢。那時坐紅旗牌轎車是極少數人才能享受的特權。

我在電影裏演一名游擊隊員，好像只有一句台詞，也可能還有些其他台詞，但我的記憶裏只有這一句：「老羅叔叔，井岡山丟了。」劇本註釋了，是要含着熱淚，用顫抖的嘴唇說的。我整天在攝製組辦公室外面的走廊，對着一扇窗反覆練這句台詞。可無論如何都沒辦法含着熱淚，更別說顫抖的嘴唇了。這讓我非常苦惱，並且越來越沒有信心，不知怎樣才能不辜負導演、製片、父母和我對自己的期望。

有一天，製片主任畢立奎跟我說，接到廠領導的通知，攝製組要解散了，所有從其他單位借調來的人，都要回原單位了。我的第一反應是鬆了一口氣，這回不用熱淚盈眶、雙唇顫抖了。接着馬上就被一股強烈的失落感襲倒在椅子上，半天說不出話來。在組裏的這段時間，我每天早上騎車進廠門上班，覺得自己已經是上影的員工了。現在讓我夾着尾巴回高中讀書，實在太沒勁、太沒面子了。而最嚴重的問題是，回學校就意味着畢業後要去插隊落戶。我終於有點熱淚盈眶、雙唇顫抖的感覺了。畢立奎見我不出聲，笑着問，你不想回學校嗎？我搖頭。他說，張瑞芳在為上影演員劇團培訓班招生，她看中你了。你要願意去，我會把你的關係轉到劇團。我拚命點頭，在短短幾分鐘裏，我的心情承受了巨大的跌宕起伏。當時我還不知道，《井岡山》劇組解散，是因為一場巨大的政治變遷正在最高層發生，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即將垮台，她領導下的「長征三部曲」停拍，只是一場序幕。



秦怡、白楊



趙丹



張瑞芳